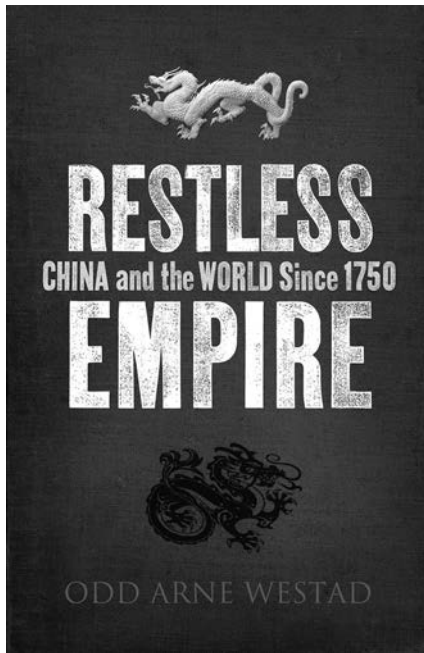


十八世紀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評 Odd A.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 夏亞峰



Odd A.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London: Bodley Head, 2012).

文安立 (Odd A. Westad) 是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這位出生於挪威、蜚聲國際史壇的冷戰史和現代東亞史專家，已出版和編著冷戰史和中國外交史專著十五部，

是國際學術界公認的過去二十年間在冷戰史研究中最負盛名、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作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冷戰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之一和冷戰國際史研究的核心期刊《冷戰史》(*Cold War History*) 主編之一，文安立對1990年代興起的冷戰史新研究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的發展和形成有着重要的影響。

冷戰史新研究的最主要特點是將冷戰史作為全球史來研究，並運用多國、多語種檔案^①。文安立於2005年出版了《全球冷戰：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我們時代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以下簡稱《全球冷戰》) 一書，研究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對越南、南非、埃塞俄比亞、伊朗、阿富汗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干涉以及它們對當今世界的影響。在資料方面，文安立著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充分地、深度地運用多國和多語種檔案以及對當事人的訪談。他希望通過追溯冷戰時期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來找到理解

文安立對冷戰史新研究的發展和形成有着重要的影響。《全球冷戰》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充分地、深度地運用多國和多語種檔案以及對當事人的訪談。作者希望通過追溯冷戰時期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來找到理解當前第三世界動蕩的鑰匙。

從標題來看，《全球冷戰》要達到兩個主要寫作目的：其一，解釋冷戰在第三世界的複雜性；其二，追溯現代世界的形成及應運而生的恐怖主義、流氓國家和政治動蕩的根源。

當前第三世界動蕩的鑰匙^②。該著作自出版以來，已獲得三個人文社科優秀圖書獎，並已被翻譯成十四種文字出版。鑒於其在冷戰史研究方面的傑出貢獻，文安立還受邀與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萊夫勒 (Melvyn P. Leffler) 教授共同主編三卷本《劍橋冷戰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③。

2012年，文安立出版了《躁動的帝國：175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以下簡稱《躁動的帝國》，引用只註頁碼)一書，這本重量級專著又一次引起了國際學術界和輿論界的廣泛關注。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和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等西方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報刊都發表文章推介該著。美國人文社會科學在線的外交及國際關係史專欄(H-Diplo)也以圓桌書評討論會的形式，邀請四位知名學者對該書進行了評論^④。

著名冷戰史研究學者、美國康奈爾大學中美關係史教授陳兼認為，「文安立這本新作的優點，不僅僅在於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可讀性強、學術性高的關於中國對外關係史的可靠敘述，更為可貴的是其思想和觀點的原創性，這是該著最主要的學術貢獻。」^⑤《躁動的帝國》一書還榮獲美國亞洲學會(Asia Society)頒發的2013年伯納德·施瓦茨優秀圖書獎(Bernard Schwartz Book Award)。鑒於中美關係在當代國際關係中的重要地位，根據文安立提供的信息，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已經閱讀了該著。

本文先簡要介紹一下《全球冷戰》一書的論述特色和學術貢獻，而把較多篇幅用來討論《躁動的帝國》一書。通過對兩書的閱讀，有助我們更全面理解文安立如何透過全球視野解析當今世界興衰、動蕩的歷史根源。

一 《全球冷戰》——解析當今世界動蕩的歷史根源

從標題來看，《全球冷戰》要達到兩個主要寫作目的：其一，解釋冷戰在第三世界的複雜性。在文安立看來，美國和蘇聯在第三世界的爭奪，實際上代表了冷戰最主要的方面和最核心的問題，但這方面的研究現在仍很薄弱；其二，追溯現代世界的形成及應運而生的恐怖主義、流氓國家和政治動蕩的根源。作者認為，冷戰對第三世界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冷戰最重要的方面既不是軍事的，也不是戰略的，也不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而是與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相關聯的。」^⑥從檔案運用的角度來說，除了使用大量公開出版的二手資料外，作者還令人欣羨、令人信服地使用了來自俄國、中國、塞爾維亞、德國、意大利、美國和南非的原始檔案，其學術功底和能耐，可謂難望其項背。從研究方法來說，除了史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外，作者還突破性地使用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體現了他治學上的創新精神和大膽探索的勇氣與魄力。

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美蘇兩國長期干預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安立

既不同意以經濟利益催動美國對外政策的解釋⑦，也不贊成以「美國例外論」為藉口，認為冷戰時期超級大國對第三世界的干涉是微不足道的觀點⑧。文安立的創見是，如果不分析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時期干涉行動的意識形態根源和文化因素，如種族歧視、對技術和現代化的信任、企業家的進取心，以及第三世界政治變革如何促使超級大國的介入等，就無法理解兩個超級大國的決策緣起。他指出：「美蘇由於自身政治生活中固有的意識形態導致它們對第三世界的干涉。」⑨由此，作者用了很長的篇幅，來描繪和分析作為「自由帝國」的美國和作為「正義帝國」的蘇聯，在對外行為上是如何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引導甚至挾持的。

除序言和結語之外，《全球冷戰》共分十章，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前三章，主要分析美國、意識形態的歷史演變過程、蘇聯，以及從冷戰初期到1980年代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思想意識產生的歷史根源。作者認為，美蘇兩國對第三世界的干涉，屬於兩種意識形態和現代化理論之間的競爭，華盛頓和莫斯科都認為自己是現代化的成功樣板，自己的意識形態具有普世性，可以引導落後國家實現現代化。

文安立指出，美國的冷戰戰略是美國對非白種人事務長期干涉這種歷史傳統的一部分。雖然前世的美國本來也是帝國主義藤蔓上的一枚苦瓜，經歷了一場艱難的反帝鬥爭之後才得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可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十九世紀開始，今生的年輕的美利堅共

和國卻日漸膨脹，搖身一變，自身也成為對外實行以領土擴張為目的的干涉性的國家。通過在美西戰爭中取得勝利，美國這個「自由帝國」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逐漸成熟，對外公然實施帝國主義政策。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夜，美國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體量龐大的經濟實力，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保護者和平衡者⑩。美國在一戰中的勝利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成功，使得反共成為美國內外政策的一個基本點。但直到二戰結束後，蘇聯才被鎖定為對世界市場和美國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

同樣，蘇聯的冷戰意識形態是十九世紀俄國對外擴張和馬克思主義普世價值的延伸。儘管斯大林強調蘇聯一國即能鞏固俄國十月革命的成果，蘇聯也逐漸形成了由意識形態主導的、以進步和現代化為標籤的對外政策，支持各國的共產黨革命，試圖以自己的形象來重塑外部世界。到了1950、60年代，蘇聯的新領導人逐漸將第三世界看作是傳播共產主義和與美國進行有效對抗的新戰場。

作者指出兩大陣營對干涉第三世界在看法上的一致性：雙方都在強調自己代表現代性（普遍性、合理性、進步、科學和自由）；雙方都認為「自身為建立一個完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的使命是世界歷史前進中的一部分」⑪；雙方的敵意都是愈演愈烈。作者認為，這種對稱性的意志、使命感和劍拔弩張的警惕與戒備是導致冷戰初期雙方激烈對抗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認為「莫斯科和華盛頓的目標不是剝削或征服，而是控制與改善」⑫。

文安立的創見是，如果不分析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時期干涉行動的意識形態根源和文化因素，如種族歧視、對技術和現代化的信任、企業家的進取心，以及第三世界政治變革如何促使超級大國的介入等，就無法理解兩個超級大國的決策緣起。

文安立將冷戰研究深邃地延伸到1970年代之後。他率先研究1960、70年代美蘇對非洲的干涉，認為美蘇的冷戰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左右了這些新興國家的發展道路。

在論述了美蘇兩國冷戰戰略的意識形態根源之後，作者考察了二戰後出現的非殖民化浪潮。在文安立看來，非殖民化運動與冷戰衝突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對新興獨立的國家來說，冷戰為它們的發展計劃提供了發展模式和資金；對超級大國來說，這些新興獨立的國家為它們提供了證明自己發展模式優越性的機會和在世界各地取得戰略優勢的平台。

通過考察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發展道路，文安立描繪了非殖民國家的一些領導人在冷戰初期試圖創造和利用「中間道路」的努力。通過不結盟運動和對超級大國之間矛盾的利用，不少新興獨立的國家能夠在日益分化的兩極世界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中立。到了1970年，不結盟運動創始人有的已經去世，有的被推翻，也有很多獨立後建立的第三世界政府被軍人推翻，但不管怎樣，西方國家仍然控制着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命脈，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轉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這是國家發展的希望所在^⑬。

文安立通過對美國及其西方盟國、蘇聯、中國、古巴以及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的考察，試圖幫助讀者了解捲入第三世界冷戰鬥爭各方的動機和目的，客觀地評判所有對第三世界冷戰造成破壞性後果的參與者。這種治史態度和方法，糾正了傳統研究中或偏袒一方、或忽視某些相關方（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作用的做法。

在確立了以上分析框架之後，《全球冷戰》第二部分（第四至十章）詳細敘述了美蘇兩國在冷戰時期對第三世界主要干涉的具體情形。這

部分根據時間順序分專題展開論述。文安立首先討論了1959年古巴革命對美國維持其在西半球霸權以及在東南亞抵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略格局的挑戰。而當時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領導的蘇聯，倡導與美國和平共處，並不熱衷於暴力革命和武裝鬥爭。文安立認為，從1960年代起，「古巴和越南在維護其革命的過程中不僅挑戰着華盛頓，也挑戰着由蘇聯為社會主義發展所設定的道路」^⑭。對古巴革命和越南戰爭，過去的研究林林總總，汗牛充棟，並不新鮮。而該著獨立物表的貢獻，不僅僅是由於重視第三世界冷戰的研究，更是由於作者將冷戰研究深邃地延伸到1970年代之後。文安立率先研究1960、70年代美蘇對非洲的干涉，是他對冷戰史研究的傑出貢獻。他細緻考察了美蘇對南非、安哥拉、埃塞俄比亞、扎伊爾、幾內亞比紹的干涉，認為這些地區一度成為冷戰真正的主戰場。該著還對莫斯科和哈瓦那在那些深惡美國模式的反殖民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中培植盟友的戰略與戰術動作詳細研究，尤其重視美蘇「干涉」政策的人命損失。作者認為，美蘇的冷戰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左右了這些新興國家的發展道路^⑮。

從1970年代冷戰緩和到1980年代美蘇對第三世界干涉的加劇，在這個大背景下，第九、十兩章討論的是美蘇分別對拉丁美洲和阿富汗的干涉。作者認為，1980年里根（Ronald W. Reagan）上台後，美國開始調整對第三世界的政策，但這只是在「方法上的改變」，政策目標並無變化^⑯。美國更加依賴反

政府叛亂和對右翼政權的支持，以加強與蘇聯在第三世界進行的拉鋸爭奪，比如在中美洲支持反對左翼政府的叛亂、支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抵抗在阿富汗的蘇軍。

而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很大程度上與蘇聯在非洲得手有關。1974至1976年的安哥拉內戰，其「勝利」使蘇聯領導人相信「世界正轉向我們一方」^{①7}。在不少蘇聯領導人看來，阿富汗戰爭對蘇聯的國家安全和威信至關重要，但這場戰爭卻把蘇聯拖進一個無底的泥潭，為此耗費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到了1980年代中期，蘇聯領導人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他們在阿富汗從事的是一場無望而失敗的戰爭，但糾結於有拋棄盟友之嫌而遲遲無法結束這場噩夢。該著認為，冷戰結束的真正原因並不是由於里根上台後美國採取強勢的政策，強化對蘇的軍備競賽，使蘇聯無力與美國抗衡，而是由於國際經濟的變化和蘇聯領導人的更替^{①8}。

在結語部分，文安立指出，「冷戰史的悲劇是〔美蘇兩國〕為第三世界提供的兩條發展道路，原本都具有反殖民主義的性質，卻蛻變為傳統意義上的為了控制其他國家的爭奪。」^{①9}在文安立看來，冷戰不僅僅是東、西方之爭，更是東、西方在南方的爭奪。那些認為美國取得了冷戰勝利的人，必須記住這一點：「從第三世界的角度來看，美國干涉的後果真是令人沮喪……這些干涉毀壞了許多社會，使得這些社會在面對自身人為的災難時更加脆弱。」（頁406）文安立認為，那些認為美國取得了冷戰勝利的史論，不僅僅掩蓋了這段黑暗的歷

史，更致命的是掩蓋了當前的美國外交政策是建築在使人誤入歧途、或將帶來更多不確定性的「干涉主義思想體系」之上的這一事實^{②0}。

文安立具有熾熱的現實關懷。他在序言中以牛津大學古典學者格里芬（Jasper Griffin）的話為全書的現實主義情懷定下了基調^{②1}：

我們是從兩種動機來考察歷史的，既有對過去的好奇，發生了甚麼，誰做的以及為甚麼；同時也有理解現在的願望，如何定位與解釋我們自己的時代、經歷和對未來的期望。

文安立將筆觸從二十世紀的全球冷戰一直延伸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當今世界，將「干涉」的歷史和影響與當代國際熱點問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給出一種堪稱經典的認知，這就是美國當今所實行的干涉主義源於冷戰時期的政策以及美國某些政策制訂者所堅持的一種思想意識——只有當世界其他國家都與美國一樣時，美國才能安全。作者完全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在該著正式出版前所做的最後一次修改時，念念不忘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並為此憂思百結^{②2}。這一現實關懷也同樣體現在其新著《躁動的帝國》中。

二 《躁動的帝國》——中國對外關係史的全景考察

《躁動的帝國》一書在廣泛利用中國、俄國、美國和英國等多國歷史檔案、文獻，並充分吸納前人研究成果及相關歷史趣聞軼事的基

文安立給出一種堪稱經典的認知：美國當今所實行的干涉主義源於冷戰時期的政策以及美國某些政策制訂者所堅持的一種思想意識——只有當世界其他國家都與美國一樣時，美國才能安全。作者完全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

《躁動的帝國》反對兩分法的歷史觀。作者認為中國和外部世界的分界線是不斷變化和模糊不清的，這種靈活性賦予中國應對變化的合法性和隨意性。這種適應變化的能力，將繼續影響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歷史進程。

礎上，敘述了1750年以來中國與世界各國交往的歷史。與過去出版的很多著作有所不同的是，文安立對中國對外關係史的研究，不僅僅關注高層政治領導人發揮的作用，而且關注普通參與者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中國外交官、仁人志士、傳教士、商人、學生、工人、海外華人、中國政府派到歐洲的勞工以及中國移民等，甚至關注到外國人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作用。作者在書寫政治史的時候，成功地將社會史和文化史也穿插其中，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該著反對兩分法的歷史觀，即認為中國現代史的發展軌迹要麼是由內部因素、要麼是由外部因素決定的觀點。作者認為中國和外部世界的分界線是不斷變化和模糊不清的(頁2)，這種靈活性賦予中國應對變化的合法性和隨意性。在中國與現代資本主義的接觸和碰撞過程中，儘管充滿了暴力和破壞性，但中國仍能得以維持和發展，這種適應變化的能力，將繼續影響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歷史進程。中國對外關係的發展軌迹，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且這種「雙重性」從十九世紀後期就已存在了。

除前言和結語兩部分之外，《躁動的帝國》共分十一章。第一、二章是對十九世紀中國社會鉅變的論析。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42)摧毀了清王朝對外交往的框架和體系，「不平等條約」從此成為中國與世界各國交往時國家層面上的主要內容。然而，「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破壞並不是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全部內容。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交往，也給一些個人和家庭帶來了貿易、

旅行和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帶動了中國人之思想和行為的革命，標誌着「中國現代性新形式的早期突破性進展」的完成(頁20)。到十九世紀末，這種變革延伸到了政治層面。與以往學術界的觀點迥然不同的是，文安立認為，十九世紀的清政府並非保守和恪守陳規，其實在很早的時候，清政府就開始修建鐵路、船塢和工廠，這與他的母國挪威幾乎同步。因此，他甚至認為，如果不是由於饑荒、農民起義和列強瓜分，清政府的現代化建設很可能取得成功(頁54-56)。

第三章主要探討了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的中日交往。十九世紀中葉，清政府曾把日本看成是中西交往中可能的盟友，但從1880年代起，中國政府開始把東鄰日本看作對手和威脅。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首次在對外軍事衝突中敗給新崛起的強國日本(頁87)。具有反諷意味的是，直到一戰結束後，仍有許多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國人認為，在科學、技術、政治和國際問題方面，向日本學習比向西方學習更適合中國。無論是中國的君主立憲派還是革命家，都把日本看成實現其政治目標的精神支柱、養分和物質來源(頁93)。

第四章討論了中國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歷史。作者認為，從1900年到1920年代後期，中國經歷了中央政權更迭、外國武裝干涉和地方割據的形成。取代清王朝的民國政府十分脆弱，只能實際控制北京附近的幾個省份。然而，中國此時的疆界和晚清幾乎相同，這就說

明即使在民國政府最為弱勢的時期，大一統國家的傳統觀念仍然深入人心。中央政府有權行使外交職能，維護國家統一。作者認為，造成這一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列強都不希望徹底瓜分中國。即便是幾乎控制了滿洲全境的日本，也不願意看到長城以南的中國被列強瓜分。日本人認識到，這樣的瓜分對日本不利，而對西方更為有利(頁124)。

另一方面，西方列強忙於歐洲戰事，也是積貧積弱的民國政府得以維持的重要原因。一戰加深了列強之間的矛盾，削弱了一些西方國家的勢力。1919年巴黎和會所確立的凡爾賽體系，把蘇聯和德國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這也為它們在1920至30年代開展與中國的合作並向中國提供援助創造了機會(頁169)。文安立認為，二十世紀最初二十年中國的對外關係，在決定中國政治格局的走向上發揮了關鍵作用。

第五、六兩章討論了十八世紀以降外國人和中國人的民間交往，敘述了外國人在中國的經歷和中國人在國外的境遇。內容涉及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商品、服飾、藥品到教育，中國人受西方的影響很大。生活在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人，對外國人的心態是十分複雜的。一方面，他們覺得自己是帝國主義侵華的受害者，外國人在中國的治外法權、租界和其他很多特權，讓中國人感到不平等(頁171)；另一方面，他們又被外國文化和優裕的物質生活所吸引。外國人在中國的存在，成了中國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許多人希望通過這個窗口了解非本土的思想和知識(頁172)。

與傳統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主流觀點大相逕庭的是，作者極富創見地認為，儘管歷經戰亂和此起彼伏、有始無終的種種政治變革，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已經對外開放。這一時期，外國的技術和經驗為中國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頁173)。儘管中共史學家把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年的中國歷史說成是「百年屈辱史」，但文安立激濁揚清地認識到，這一百年中國與世界交往的積極意義要大於消極意義，它有利於一個「現代中國」的產生(頁210)。另一方面，從十八世紀開始，中國人就開始移民海外，最初主要是到東南亞國家，後來也有到美洲、澳洲等地。移民的中國人大多來自福建和廣東兩省。中國移民最大的作用在於把新思想和新技術帶回母國並加以傳播，從而吸引更多的人移居海外，建立新的商貿機構(頁216)。這些中國移民在尋求個人利益和發展機會的同時，也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和報效祖國的願望。

第七、八、九三章論述的是從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到1960年代末中國的對外關係。二戰爆發時，中國人對外交往的熱情及其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積極認識已經大為弱化。戰爭的痛苦經歷使中國的知識精英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信任銳減，於是他們開始尋求促使中國現代化的新的政治經濟模式。

第七章探討的是1937至1945年的中國抗日戰爭。作者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國際史的真正開端，是中國人第一次大範圍與外國人發生的接觸。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第一次與外國人打交道就是一個日軍軍

儘管中共史學家把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年的中國歷史說成是「百年屈辱史」，但文安立認識到，這一百年中國與世界交往的積極意義要大於消極意義，它有利於一個「現代中國」的產生。

作者認為1937至1945年的中國抗日戰爭是中國現代國際史的真正開端，是中國人第一次大範圍與外國人發生的接觸。中國加入現代國際政治的第一課是痛苦的，至今仍深刻影響着中國人對外交往的行為。

官用他們聽不懂的語言對他們吆三喝四(頁269)。毫無疑問，中國加入現代國際政治的第一課是痛苦的，而這種痛苦的經歷隨後被悲情地放大，形成民族主義色彩強烈的神話與教義，至今仍深刻影響着中國人對外交往的行為。

第八章探討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對外關係。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源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一批知識份子對中國前途擔憂的產物。他們認為拯救中國需要走一條能使中國富強的新路，要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楷模而不是賤民(頁285)。作者認為，最初影響中國共產黨人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他們的直接繼承人(直到1980年代的鄧小平)最關注的是，如何利用列寧和斯大林在蘇聯使用的方法在中國建立一個現代的、強有力的國家，包括強化黨權、統治權、全社會的軍事化及對全體黨員和人民的嚴格控制(頁285-86)。從1945至1960年間，中國共產黨人與蘇聯共產黨人的接觸，就是向他們學習如何建立一個執政黨和國家機器。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希望建立一個蘇聯模式的新國家，拒絕對國民黨建立的國家機器的承襲，也就是與1911年建立的國家機器的徹底決裂(頁202-203)。

第九章探討了從1960年中蘇分裂到1970年代初中美關係實現緩和之前的十年裏，中國是如何逐漸斷絕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並走向孤立的歷史。儘管中共領導人認為，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使國家富強，但結果卻事與願違。到1970年代初，中國仍然是一個十分貧困的

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無所作為。於是一些思想活躍的中國人猛然覺醒，反思1920年代中國知識界思考的問題：怎樣才能把中國從貧困和停滯中解救出來？怎樣才能促使中國走向成功並實現現代化？為甚麼作為一個中國人，離開中國就可能變得成功和富有，而留在中國卻遭罪受窮(頁363)？

自1950年代後期起，中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支持亞非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擁有一些支持者。但從1960年代中期起，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左派反政府武裝，與第三世界很多國家的關係變得很緊張。文安立對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總體是否定的。他認為，1960年代初，中國由於同時對抗美國和蘇聯兩個大國，在第三世界取得一定的影響力。但從1964年起，由於毛澤東極左的內外政策以及與蘇共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拒絕與蘇聯在援越抗美問題上採取聯合行動，最終得罪了越南，埋下了1979年中越戰爭的種子。

中國從1960年代起執行的極端的反蘇政策以及從1970年代起的聯美抗蘇政策，最終導致蘇聯解體，從而成就了美國在後冷戰時期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全球霸權(頁376-77)，在今天看來，這應該算是一個極大的戰略誤判。文安立完全不同意西方某些人認為中國領導人在外交方面十分精明的看法。他批評當今的中國領導人由於缺乏與一個大國相匹配的全球視野、格局與胸襟，所以對國際事務的關心尚淺。文安立同時認為，「中國在軟

實力方面極度缺乏吸引力，在東京或是首爾，甚至台北或是新加坡，頭腦清醒的年輕人是不會去下載中國的音樂、看中國的電影、吸取中國的思想觀點的。」(頁459)

最後兩章探討的是自1970年代初中美關係緩和以來，中國重新回歸國際社會的歷史進程。該著認為，如果給予機會，多數中國人會擁抱變革。1970年代中國開啟的改革進程，是中國二百五十多年來對外交往合乎邏輯的發展，而並非別出心裁的異峰突起。毛澤東時期的中國與世隔絕，才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異常時期(頁362-63)。在此，文安立又一次顯示出強大的學術勇氣和敏銳洞見，他不同意學術界普遍接受的一個觀點，即認為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並獲得成功是因為他看到了毛澤東極左政策的失敗，所以決定徹底改弦易轍。文安立指出，1970年代的中國，具備着向許多不同方向發展的可能性。波爾布特(Pol Pot)為首的共產黨在柬埔寨實施的大屠殺政策為一個極端，而台灣政治向民主發展為另一個極端(頁371)。

文安立認為，中國存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潛力，並不是由於共產黨政權在過去二十年對其的破壞，恰恰相反，是因為在共產黨統治之前，中國已經經歷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是中國受美國影響最關鍵的兩個十年。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藝術，甚至是消費習慣，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幾乎無處不在。雖然中國也恢復了與亞洲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但很多中國人始終認為，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關係就是與美國的關

係(頁366-67)。的確，由於中美關係的改善，中國結束了在國際上的孤立狀態，得到了現代化進程中所需要的先進技術。美國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積極支持中國融入國際體系，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文安立認為，中國過於看重美國經驗，可能會忽視其他發展模式；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發展模式，可能對中國同樣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這裏，文安立提出了一個既有學術性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中國在美國和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中扮演甚麼角色？中美關係緩和之後，中國是不是由國際體系的「局外人」逐漸轉變為「局內人」(頁378)？即便如此，作者認為中國對外關係的「雙重性」仍在發揮作用，主要表現為：一方面，中國願意與國際社會接觸；另一方面，歷史上被列強欺侮的痛苦經歷發酵而成的不能釋懷的悲情，又不時地轉化成一種警覺、懷疑、矛盾、猶豫與矜持。因此，文安立認為，中國在設計和實施現代化建設的宏偉規劃時，會區別對待「外國模式」。中國今後與國際社會的交往，不僅在於中國自身，而且在於其他國家如何對待中國(頁462)。外部世界應該如何與中國人打交道？它的機會、格局與效果，可能更多地取決於對中國人這種心態的準確迎合與把握。

三 中國崛起後的中國與世界

《躁動的帝國》一書對近代中國與歐洲、美國、蘇聯和日本的關

文安立提出了一個既有學術性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中國在美國和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中扮演甚麼角色？中美關係緩和之後，中國是不是由國際體系的「局外人」逐漸轉變為「局內人」？作者認為中國對外關係的「雙重性」仍在發揮作用。

文安立基本同意中國將會崛起的觀點，但並不認為中國將取代美國而成為超級大國。中國在成為一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全球性大國方面，顯然缺乏關鍵性的準備，其中最大的基準點，就是中國需要一個真正的全球戰略。

係着墨較多。作者認為，源於西方的帝國主義、共產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作為政治思潮和社會運動，對近代以來的中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裏，中國歷史充滿動蕩，飽經滄桑。這些動蕩與滄桑和儒學傳統、地理位置以及中國人對國家傳統的敬畏（頁4），奠定了中國人世界觀的三大基礎：

第一，公正原則，該原則是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對中國政治影響的關鍵因素。儒家學說認為，公正就是在家庭和國家內部、國家之間保持得體、和諧的關係。統治者的真誠比任何形式的程序公正更為重要。因此，在當代中國人看來，外部世界在過去的二百年裏對中國是不公正的，這種不公正待遇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時常提及的話題（頁5）。中國人認為，國際交往應遵循公正原則，而國際關係中的危機正是由於違背公正原則引起的。

第二，規則和禮儀，這也是中國政治思想體系的核心。多數中國人認為，十九世紀以來由西方主導建立的國際體系，更多的是混亂而不是秩序。尋求國際交往中的普遍原則，一直是中國外交政策的主旋律（頁5）。

第三，「自我中心」的觀念一直是主導中國人心態的關鍵因素。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的鄰邦普遍接受中國文化，促使中國人形成了中國處於世界中心的宇宙觀，認為中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尤其是在東亞，中國應該承擔領導責任。

因此，文安立特別強調，「在考察中國外交政策的過去、現在和

未來時，一定要記住以上這三個概念。」（頁6）

由於中國經濟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中國現在已經是個名副其實的政治經濟強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關於中國崛起的話題，在美國學界、政界、商界受到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在不久的將來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約在2030年）。屆時，中國在政治上也將對美國取而代之，主導世界²³。另外一些學者卻認為，中國的崛起並不會呈現直線上升之勢，阻礙中國發展的最大障礙還是中國自身的歷史包袱²⁴。在這個問題上，文安立的觀點又一次顯現出前瞻性，他認為，歷史對中國人來說是個如影隨形的包袱，但很多的著述者卻在這一點上低估了中國人的應變能力。文安立認為，儘管中國外交有種種失誤，但是對中國的鄰國和美國而言，當今的中國確實已經構成對它們最大的威脅。文安立基本同意中國將會崛起的觀點，但他並不認為中國將取代美國而成為超級大國。在他看來，中國在成為一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全球性大國方面，顯然缺乏關鍵性的準備。這個準備的最大的基準點，就是中國需要一個真正的全球戰略，而這一點，似乎現在或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還不太容易看到（頁465）。

具體到中國目前面臨的領土紛爭（例如南海諸島嶼以及釣魚島），文安立認為，爭議產生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國人的理想主義，認為中國可以在國際體系中尋求正義。在

中國人的認識體系中，中國近代飽受列強凌辱與巧取豪奪，其部分領土（包括釣魚島）被列強瓜分。代表着國民意志的當今中國領導人，並不要求恢復中國在近代喪失的全部領土（例如外蒙古），但中國要求恢復對沿海島嶼的控制，這種國家政治的不可妥協的強烈訴求，與「近代受列強凌辱」的歷史背景和在國際社會「尋求正義」的願望奇妙而順理成章地聯結在一起，具有足夠有力的邏輯力量。所以，這並不是簡單意義上流氓國家的無賴觀點，但在客觀上卻是自利和片面的。最近幾年中日兩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紛爭，在文安立看來，呈現出「中日雙方在戰略觀方面的嚴重失誤。北京和東京的領導人都知道，妖魔化對方對己無益。事實上，中日雙方愈來愈依賴對方，以便取得更大成功：中國的強國夢和日本的經濟復蘇。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一方能夠或者願意擱置歷史上的恩怨」（頁418）。

《躁動的帝國》對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這一課題，從嶄新的視角切入，作了深層次上的歷史文化因素探討，這是對中國研究和當代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貢獻，對了解和認識當代中國的外交戰略和行為規範具有重要價值。筆者認為，從史學的角度，該著打破了傳統史學界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兩個重要神話，其創意豐富、靈感四溢的敘述，向人們還原了一個可能更接近歷史真實的客觀鏡像。

其一，史學界長期以來將滿清中國描繪為一個停滯不前和被動孤立的社會。但在文安立的取景框裏，十八世紀的滿清中國依然充滿活力、雄心勃勃、欣欣向榮，在亞

洲地區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在十八世紀的衰敗不僅僅直接緣起於清王朝的孤陋寡聞與偏狹以及外國人的邪惡。讓人感到特別新鮮的是，文安立強調，不能將滿清的衰敗和中國近代百年的恥辱史完全歸咎於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凌辱。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傳統上將中國說成是一條熟睡的巨龍，只是在西方人到達之後才慢慢蘇醒，這樣的比喻很不恰切。為此，他展示了一幅更為複雜、更為恢宏而多樣化的近現代中國的全景圖。

其二，史學界長期以來將近現代中國恥辱史主要歸咎於列強入侵，很少將中國社會的落後與中國人的「自殘」聯繫在一起。作者憑藉對史料的堅實切磋，認為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是對當時「社會秩序最大的威脅」（頁46）、1958年的大躍進和大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的災難」（頁336）。

然而，該著畢竟是一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作品，其明顯的西方學術取向及某些源於意識形態的激烈或偏頗的觀點，諸如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打死的中國人比消滅的日本鬼子多得多（頁272）、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以及波爾布特在柬埔寨實施的大屠殺政策相提並論等等（頁334），恐怕很難為相當一部分中國學者與讀者認同。

作為一部學術性極高的力作，《躁動的帝國》文字優美，言簡意賅，加之諸多歷史趣聞的點綴，使其既真實可靠又清新可讀。該著和近期出版的幾部史學作品，如普拉特（Stephen R. Platt）所著的《太平天國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史學界長期以來將滿清中國描繪為一個停滯不前和被動孤立的社會。但文安立認為十八世紀的滿清中國在亞洲地區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強調，不能將滿清的衰敗和中國近代百年的恥辱史完全歸咎於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凌辱。

《躁動的帝國》展現了中國歷史的複雜性、多樣性和活力，提供了客觀解讀中國歷史與國情的方法論、坐標系與全新的視角，有利於讀者更好地認識當今中國和未來中國發展的歷史脈絡與本質特徵。

Kingdom)、藍詩玲 (Julia Lovell) 所著的《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米特 (Rana Mitter) 所著的《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以及三位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 (Perry Link)、趙文詞 (Richard P. Madsen) 和畢克偉 (Paul G. Pickowicz) 主編的《躁動的中國》(*Restless China*)^⑤ 一樣，都根基於嚴肅的史學研究，展現了中國歷史的複雜性、多樣性和活力。這樣的著作提供了客觀解讀中國歷史與國情的方法論、坐標系與全新的視角，十分有利於一般讀者更好地認識當今中國和未來中國發展的歷史脈絡與本質特徵。正如文安立所認為，在過去的二百五十年中，中國的變化是充滿活力的，但未來的中國還會有更多充滿躁動的變化。

註釋

① 關於冷戰史新研究，參見陳兼、余偉民：〈「冷戰史新研究」：源起、學術特徵及其批判〉，《歷史研究》，2003年第3期，頁3-22。

② Odd A.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I, *Origins, 1917-1962*; vol. II, *Crises and Détente, 1962-1975*; vol. III, *Endings, 1975-199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④ 參見 *H-Diplo Roundtable Review XV*, no. 2 (2013), www.h-net.org/~diplo/roundtables/PDF/Roundtable-XV-2.pdf。

⑤ 參見“Review by Chen Jian”, *H-Diplo Roundtable Review XV*, no. 2 (2013), www.h-net.org/~diplo/roundtables/PDF/Roundtable-XV-2.pdf。

[h-net.org/~diplo/roundtables/PDF/Roundtable-XV-2.pdf](http://www.h-net.org/~diplo/roundtables/PDF/Roundtable-XV-2.pdf), 6。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Odd A.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396; 1; 15; 4-5; 5; 104; 158; 207-87; 337; 241; 364, 401; 397; 404; 1.

⑦ 用經濟利益解釋美國對外政策的代表作，參見 William A.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59)。

⑧ 這方面的代表作，參見 John L.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⑲ “Author’s Response by Odd Arne Westad”, *H-Diplo Roundtable Review VIII*, no. 12 (2007), www.h-net.org/~diplo/roundtables/PDF/GlobalColdWar-Roundtable.pdf, 29-30.

㉑ Arvind Subramanian,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㉒ Edward N. Luttwak, *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㉓ Stephen R. Platt,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New York: Vintage, 2012); Julia Lovell,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London: Picador, 2011);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Perry Link, Richard P.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Restless Chin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3).

夏亞峰 美國長島大學 (Long Island University, Brooklyn) 歷史系教授